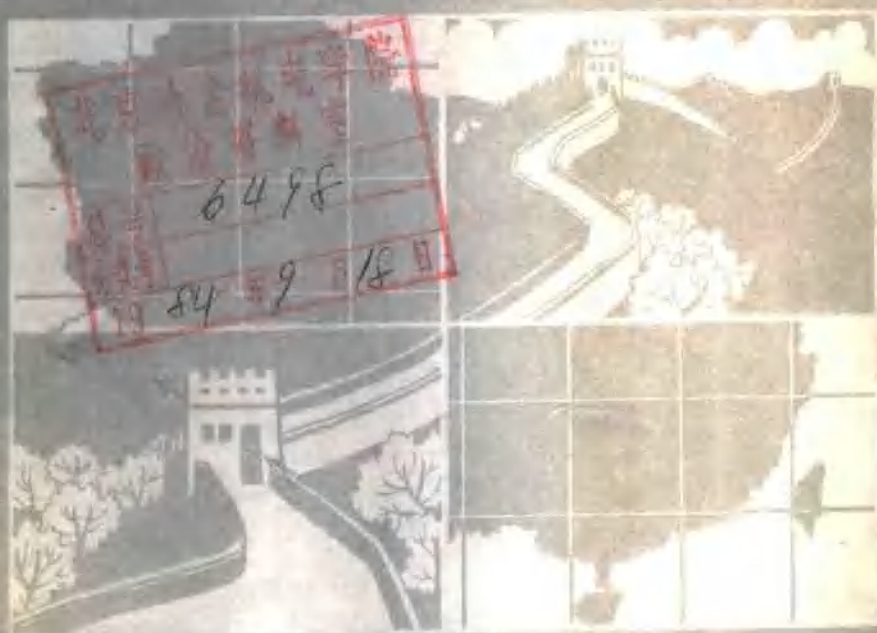


《参考消息》专辑 4

美国的新中国通读中国

——美国研究机构对中国情况的调查报告选编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参考消息》专辑之四

美国的新中国通谈中国

——美国研究机构对中国情况的调查报告选编

主 编 杨效农

责任编辑 戴增义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前 言

本教材是在 1983 年编写的化学、化工类《国外文献介绍和检索》(试用教材)及 1984 年编写的化学、化工类《文献检索和利用》(补充教材)的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补充、修改而成的一部较为完整的化学、化工类的科技文献检索课程教材。全书共分五编十五章,及两个总附录;内容包括文献和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化学、化工类的综合性检索工具,单一文献类型检索工具,化学、化工类工具书,计算机文献检索,以及其它化学、化工类检索工具和期刊简介等。各类原始文献的索取方法、途径及与此有关的工具书,则分别置于各相关编章中介绍。

科技文献利用这一主题,本教材还没有专门论及,准备将来再印时予以补充。但是,为了清楚表达本课程的性质和保持书名的稳定性,所以本教材还是定名为《科技文献检索和利用》(化学、化工类)。基于客观原因,本书对国内检索工具介绍很少,这有待将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再予增补。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化学、化工类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可以作为化学、化工类科技文献检索课程的教材及生物化学、药学化学等有关专业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化学、化工类的教师和科学技术人员的文献检索参考用书。

本书的第五编由李京华编写,其它各编及附录由冯白云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图书馆宋鸿国付研究馆员的指导;化学与化学工程系的一些教师,如孙以实付教授、高万良付教授,及以我馆文献检索与利用教研组的其它同志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教材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使用本教材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印时修正。

编者 冯白云 李京华
1985 年 8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走上一条新的航向——引向何处?

.....鲍大可(1)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世界银行代表团(18)

一年来中国政策的重要变化

.....卡罗尔·李·哈姆林(46)

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

.....美国大西洋协会(58)

里根走好运

.....罗伯特·A·曼宁(101)

台湾: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

.....马丁·L·拉萨特(115)

中国的悄悄的革命

.....唐纳德·扎戈亚里(167)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走上一条新的航向——引向何处？

鲍大可（多克·巴尼特）（A. Doak Barnett）

本文作者鲍大可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仅一九七六年后就五次访华。本文系作者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在密执安大学纪念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第二次年度学本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作者认为，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比本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是稳健而渐进的改革，是一个关键性转折，一场新的革命。朝这个新航向走下会必将取得成效。报告列举了近几年中国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十五个大变化和经济方面的二十项重要政策改变。他认为今后中国改革的道路虽然缓慢并可能有些曲折，但将在新的道路上持续前进。

毛泽东逝世以后，六年已经过去了。毛时代的结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将朝何处走？在估量中国的前景时，人们应该是悲观者还是乐观者？

我不想假充我真正能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我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今天晚上，我想讨论一下我认为有助于分析上述问题的某些方面。同时，还要讨论在估量今后若干年的中国时应考虑进去的某些因素。

我要谈的第一点是，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对前一阶段作出反应和休养生息的阶段；在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以后，现在正在寻求一个“正常状态”。正如几年前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gton）指出的，大部分较大规模的革命，在达到剧烈和走向极端的顶峰后，要经历一段他称之为“发革命热以后的恢复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革命运动还是社会本身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在革命斗争高潮时所特有的紧张。我从来不怀疑中国终究要大规

模地反对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所特有的那种对想像中的乌托邦式的极端主义的信念。毛和中国最高层的激进分子们想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但是他们只是将它推迟了——而不能阻止它。

在这个反作用的阶段里，“公众情绪”——使用一个不确切但是却有用的词——的变化是惊人的。我完全意识到笼统地概括中国人的态度和思想是危险的。这种笼统概括的出发点必须是承认外国人不可能“懂”；我们只能根据掌握的情况做些猜测。然而，我相信，最近出现了态度上的重大变化；我能在毛逝世后我的四次访华中——一九七七，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和最近的一次，即今年夏天——看到这种态度变化的作用。

我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能有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在中国的三个主要城市自由地四处走走。这三个城市我很熟悉，并且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定期地去访问过。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今天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真正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所受的的压力比前几年要小得多。看不到人们有太多明显欢乐感。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对党和党的理论、政权的官僚主义失去了幻想而感到看穿了这一切。但是，我确实看到有迹象表明人们抱有希望和谨慎的乐观主义——希望有一个更为“正常”的生活和逐步改善生活水平，并且对中国现领导朝着这个方向所奉行的方针政策保持谨慎的乐观主义。

在我今夏访问的中国三个主要城市和一个农村里，普通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感兴趣已经到了触目的地步。紧张程度处于低水平，而且能清楚地感到一种政治上的松弛。无论是在建筑物的墙上或是与个人接触中，标语口号式的东西都大为减少。人们在交谈中以及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比以前更为坦率和务实了。大多数人的动力表现在追求个人的、自己的和家庭的目标上，以非政治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寻求更加舒适的生活。因此，只要认识到中国现在是处于对不久以前的革命极端主义作出反作用的时期，就可以懂得中国现阶段的一些特点了。

然而，这并不能显示中国将要朝什么方向去，并且，如果我们只从这些方面来看当前的趋势，那就弄不清楚毛以后的中国的最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新

路。我要强调“改革”这个词，为的是和毛主义者所说的“革命”作对比。中国现在的领导——不无道理地——坚持说他们并没有放弃革命，只是追求革命的方式和前不久的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当前的做法是会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分子称之为背叛其革命观念的那种做法。事实上，和毛主义时代的末期相比，当前的政策显然更接近于改革而不是革命。

今天，侧重的是安定而不是斗争，社会和谐而不是阶级斗争，以及使意识形态和政策去适应实际以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毫不妥协地通过改造思想来改造社会和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新路线强调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戏剧性的“跃进”，并且集中精力用切实的方法来增加经济产值而不是追求平均主义的目标。

在过去的六年中，尤其是自从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明显取得首要地位后，中国的领导人逐渐地确定了一套全面的互相联系的全国性政策，讲究实效地和通过试验以求解决国家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也打算在若干重要方面改变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基本制度。在介绍这些政策之前，我先就应该如何看待新路线产生的背景作一总的说明。

任何熟悉中国过去对改革所做的努力的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存在着对改革的巨大的内在障碍；过去改革的历史是一连串失政的记录。然而，我相信，中国的现领导进行改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数改革者的机会为好。对这种观点，有些人是不相信的。他们只看到多年的官僚主义管理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又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显然，其中某些后果——包括失去了几乎十年的教育以及对党和党的主义的信念的削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这些问题，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比他们之前的改革者享有某些重要的有利条件。

有一个有力的理由是，和过去的改革比较，中国的新方针是建立在领导层内部更加一致和更密切地反映了社会“舆情”的基础上。在过去几乎二十年中，许多——可能是大多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赞成同现政策相近的总政策。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中国有这些问题，但是，今天这个国家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国际关系的现状较之共产党执政以来——甚至可能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稳健的、渐进的改革。

为了证明我这些笼统的概括，我想谈谈下面的看法。我说中国的新方针是建立在相对来说较大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意思并不是说，自从一九七六年以来北京的领导层内部没有严重的分歧。事实显然不是如此。权力之争几乎经常在进行，同时在许多具体的政策上也不断有争论。然而，自从邓小平在政治上占据了首位以后，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最高领导层，其中大多数成员明显地支持他、陈云和他的其他亲密伙伴们所确立的政策的方向。

在我看来，今天在最高领导层中的一致性比五十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强。众所周知，从五十年代末到毛逝世，中国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和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是北京领导层的严重分裂，最后这到了毫无希望的两极分化。但是，在短短的四年内——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二年九月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邓小平不但清除了在最高领导层中最强烈反对改革的新的总方向的人，他还很快地建立了一个积极支持他的政策的基础，这个基础比二十多年来任何居于最高领导地位的人所享有的基础都要大。

几乎没有可能会让那些要扭转总航向的领导人卷土重来——也就是开倒车，并且恢复类似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方针。在政治机构的下层中仍然有许多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升上来的人——反对邓小平的某些政策。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已保证要逐渐将他们清除掉。但是我看不到在这个政权的第二层或是第三层有人能策划“没有毛的毛主义”而使之复辟。

回顾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政策的历史，当前许多政策的趋势的根源都来自三个较早的时期：（一九五六——五七、一九六一——六二和一九七四——七五），这一情况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所有这几个时期中，中国的一些最能干的领导人和计划者都赞同和现在类似的那些政策。他们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在每个阶段中的总趋势是——就象现在一样——脱离由意识形态决定的集体主义而趋向试验、稳健和务实。

如果毛在这几个较早的阶段愿意支持这种趋势，中国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整个发展道路就会大不相同。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就从根本上反对降低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最务实的做法。紧接着上述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毛——或者把他作为象征的激进分子——都以

新的革命高潮来打退和压倒务实的趋向：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计划；一九六二年号召重新开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最后，在七十年代中期，由那些激进分子以毛的名义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这种形式还会再发生吗？不能说不会，但是看来十之八九不会发生。自从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那些灾难以后，中国大多数的领导和群众都普遍同意——不论他们在其它方面有什么不同意——再也不应该重演那种带有高度破坏性的革命运动了。

我的另一个笼统的概括是：现在稳健而渐进的改革，可能比一九四九年以来，甚至比本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如果你们认为这一论点是过分夸张，那么，我请你们重温一下中国近期的历史。

在本世纪的整个前半叶，中国不断陷于军阀冲突、大规模的內战、受到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或者实际上的侵略——而且这些往往同时发生。那时中国不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统治下，并且在國內和国外都享有和平。只是在三十年代短短的大约五年到七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中央政府才真正有点机会来试图规定和贯彻国家的改革和发展的政策。而在那一阶段，新建的国民党政权还没有统一全国。它只控制着部分地方，并且不断地面临属于军阀一类的地方首领的挑战和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以及日益加剧的外国压力，最后发生了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全而入侵。

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共产党接管以来，在一些根本的方面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除台湾外）。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制订和贯彻全国性的政策了。在大陆上没有了军阀的对立或是內战。虽然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的领导人感到中国是处于外来的威胁之下——并且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八年中而面临着军事危机——但是，自从五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就不必把它的主要精力和财力用于大规模的对外冲突上了。

然而，尽管有些因素，从五十年代本到毛逝世为止，中国领导人中那些赞成稳定和制度化——像邓小平现在所做的那样——而不是搞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从未有过一个有利的时机来规划一条稳健的改革路线，以求能持续地、长期地发展经济。由于毛和那些与他有着共同的革

命意识的人坚持要使国家经常处于紧张变革状态，相对的稳定阶段只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之间短暂的喘息时期。

从一九四九年到毛逝世的整个二十七年间，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三个短暂的相对务实阶段也只是在理论上有可能使政权稳定、制度化和自由化，并且设计一个可行的长期发展规划。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其中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五七年才是真正有这种可能。那时，中国领导层的一致性还相当强，整个国家在内部和外部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致治或经济危机。在后两个阶段，虽然有些政策可以和现在的相比，但是在领导层中缺乏强有力的一致性，并且忙于从先前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而不是考虑长远的目标。在毛放弃他早期的务实精神（那是他在一九五七——五八年放弃的），直到他逝世前，中国要想强调稳定和长期发展经济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毛逝世后的六年尽管时间很短，却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在本世纪以来所享有的最长的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政策持续的阶段。

这条由邓小平所规划的新方针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如何？我们只能说它“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主要是取决于政府，可以说目前的方针很可能会持续多年——至少是在整个八十年代，或者整个九十年代。我知道现在作这样的预言有些轻率。只有时间能证明我是否正确。然而我相信这是个合理的判断。从目前来看，邓小平安置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如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政府总理赵紫阳——是新方针的坚定奉行着，而且很有可能在邓离去后存在下来。再说，我相信即便这些人在致治上站不住，其它的领导人也不见得会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从根本上把中国引向任何新的方向。不难想像，如果中国遇到了十分严重的失败，激进的毛主义又会吸引某些领导人。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很多年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在八十年代不会出现。

如果这个新方针看来很可能持续至少十年到二十年，那么，了解它有哪些特点就显然很重要了，最近在致策上有哪些重大的改变？现政权的目标和重点是如何变化的？新方针将引向何处？

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宣布说：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新的革命。这是过于戏剧化的语言吗？我想不是。如果中国能将已经开始了的这种计划进行到底，历史将会判断它确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并且在今后的时间內将出现一场

“新的革命”——一场和毛在他的晚年想进行的大不相同的革命。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简单谈一谈几个一九七六年以来出现的政策上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可以概略地分为三类：

一、那些旨在稳定政权、使之制度化、自由化，以改进决策过程来改革政治制度，抑制政治上的过火行为，并且提高中国政府机构的效率的政策。

二、那些旨在调整经济重点，提高生活水平，并且为长远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打下牢靠的基础，并从长远出发来改造基本的经济体制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政策。

三、那些旨在同国际上开展新的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的联系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的政策。

我只能概要地就每一类列举几项最重要的政策趋势。我希望这至少能够为中国新方针的总特点提供一个总概念。我首先要讲的是：那些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它们不仅影响到政治组织，而且也影响到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观念。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有：

一、全面地重新解释意识形态问题，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下定义。它的主要目的是和教条主义作斗争，并且鼓励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时能实事求是，能灵活变通。

二、将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重新进行评价，把他缩小到常人的形象，同时仍赞扬他早期对革命的领导作用，严厉批评他独断专横的一人统治和五十年代以来主要的政策错误。这样做的一个根本目的在于防止重新出现独断专横的一人统治。

三、采取措施修政和重新组织中国党内和政府中的最高决策和行政管理机构，使之恢复活力，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秩序的、可预见的、协同合作的决策程序，同时在制度上设置障碍以防止一人统治。

四、在贯彻政策的方针上有重大的转变。从使靠发动群众到依靠正规化的，甚至例行公事式的行政手段，加上采取比过金更好地区分党和政府的作用的措施。现政权为了某些原因仍将采用群众运动，但是它决心避免具有毛时代特点的那种运动，因为它们会严重破坏党和政府的正常活动。

五、在“改革”和“精简”的口号下，进行一个带有深远意义的党

和政府的官僚机构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中央一级的机构改组已经接近完成，不久就将扩大到省一级。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中央机关的数量，有一部分是通过机构合并，并且将其中的工作人员人数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一个根本目的是要使官僚机构合理化，以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六、第一次创建了高级官员强制退休的制度，目的在于淘汰老朽的、不称职的和政治上表现不好的干部。这一方案已经在把新鲜血液注入到官僚机构中去，降低平均年龄和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

七、在人事方针上明确地从强调“红”——正确的政治态度——到强调“专”——业务能力。这一点反映在招聘工作人员和提拔干部的政策上。

八、大力强调发展高质量教育的必要性，以产生具备适应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需要的一代新人。它涉及到在教育问题上转向培养尖子。

九、强烈主张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由文官占优先地位，它反映在预算中用于军事现代化的拨款较低上。十二大以后，现役军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的代表额有所增加，但是军事现代化的地位仍低于民用经济现代化。

十、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采取重要措施，开始在中国建立完整的司法制度。现政权采用了新的党章，起草了新宪法，通过了刑法，广泛地制定了新的经济法令和条例，并正在实际生活中应用。

十一、公布于众的数字和其它信息的数量增加了。允许就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方针政策有某些比较大的讨论自由；并且允许相当程度的——虽然仍有限度——文化“解冻”。中国人不喜欢“自由化”这一词（事实上，他们当前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有些西方人士争辩说政府在一九八〇——八一年取缔了“主张民主的异议派”，并且随即加强了对公众发表意见的限制，这意味着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化。无论如何，如果把今天的情况和毛时代的最后几年作一比较，甚至同五十年代作一比较，在我看来无疑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尽管是在排除任何鼓吹非共产主义民主的限度以内。

十二、为数百万人恢复名誉，他们是这个政权在从五十年代以来进行的清洗运动、群众性政治运动以及有意的搞阶级歧视的方针的受害者。

这不仅纠正了过去的公正，并且旨在结束过去把人打成敌对阶级分子而加以虐待所形成的一种制度。

十三、在中国内部恢复统一战线的概念，强调争取非党人士和团体的支持的重要性。这在实际权力上来说意义不大，但是作为政权试图扩大支持现行政策的基础的决心来看，则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十四、重新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包括非党人士。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比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任何时期都要好的待遇，他们被视为政策顾问来使用，并且以专家和內行的身份而居要职，规模空前。

十五、努力扩大有重大意义的地方上的政治参予。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做法是开创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地方官员，直到包括县一级在內，此外，政府还试图在经济企业中组织一种新的职工委员会。

所有这些变化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试图改变——中国具有专制主义和共产主义特点的政治制度。然而，合在一起，它们就具有潜在的重要性。如果执行得有成就，它总有一天会对制度如何运转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还会对制度同人民的关系，以及——在北京看来是最重要的——制度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新方针的核心是经济重点和政策的变化，而政治上的改变首先是为了支持新的经济政策。

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毫不含糊地声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部门的现代化必须优先于其它目标。即使是在一九七八年以来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经济政策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当戏剧性的变化，并且开始对中国人民和经济制度的运转产生相当的影响。“调整”以经济为名进行的某些政策变化集中在急这的经济问题上，对经济进行“整顿、改革、提高”的其他三条口号意味着政权在认真地努力改革经济制度。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全面介绍中国经济政策变化的全貌，但是，让我列举几个我认为是重要的政策改变。它们有：

一、关于调整中国的投资和消费的基本比例的决定，把消费提高到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后达到百分之七十五），把中国更多的产品用于人民的当前需要。这一转变能持续多久还要看一看。但是，即便在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增加，其比例也不见得会回到过去的

高峰时期。

二、在经济建设重点中明显地把民用摆在军用之上。这不仅反映在中国的财政预算上，同时也反映在有意识地使一些军用工业转向生产民用产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

三、在投资政策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降低对重工业投资的比例而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投资。在绝对数字上，重工业在投资额中仍占大头，但是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投资的增长是很可观的。

四、采用了把农业提高到比过去优先得多的政策。这些政策号召农业搞多种经营，加强把科学技术用于农业现代化的努力，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些是通过调整价格，但是主要是通过改变农业组织形式来实现。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之一是把农业上的决定权下放到很小的范围——尤其是到各个家庭中去。这已经等于是事实上的非集体化了。尽管国家仍然保留着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今天中国几乎有一半的农业人口又回到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了。

五、加速发展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手表、照像机，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这些工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从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着，能买到的耐用消费品——越来越多，这一点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已经很明显，而至少在某些农业地区也是如此——是近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六、保证提高平均生活水平——只能逐步提高，但是希望能达到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程度。中国平均家庭收入的水平仍然很低。自从在一九七八——八〇年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有过一次相当大的增加以后，收入增加的速度提慢到爬行的地步。在一九八一年，实际平均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一一点八。不管怎样，领导对今后提高收入的决心比一九四九年以来任何时候都大。

七、越来越注重在城市和农村发展住房建筑和城市中的社会服务设施。房屋建造的发展速度很快——尽管要克服由于以往的政策所造成的住房不足，还要很长时间。有意思的是，不久以前（一九八一年），农村新建房屋的增长速度（百分之二十）竟比城市还要快（百分之五点五）。

八、制订这样一项工业政策，全面放慢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但是要

求发展关键工业，那些严重地阻碍着全面发展的瓶颈——尤其是能源和交通运输。最后，重工业的总投资额很可能还会有所增加（有迹象表明在有几个部门可能已经开始了），但是中国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回到过去那种过于强调重工业的做法。

九、努力加强计划生育。中国领导人自己都强调，如果他们不能降低人口增长率，那么他们的总政策就不会成功。他们采用的控制人口政策是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是任何大国都没有尝试过的，现在号召把一家只生一个孩子作为将来的指标。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二〇〇〇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零（鉴于最近人口增长率又略有上升的趋势，要达到这一目标是极为困难的）。

十、放弃认为中国可以“大跃进”的发展的观念，而代之以保证实现稳定的增长率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设想在最近的将来，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在谈到八十年代的经济目标时口气比较实际。（然而，他为二〇〇〇年所规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意味着九十年代的增长率将是非常高而不现实的。）

十一、不仅在國內建设，同时也主动引进中国搞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在工业部门。当前是侧重于提高现有工厂的水平而不是进口成套设备，这是明智的现实主义的做法。

十二、努力改进中国的统计与计划机构和程序。尽管当前的改革要求在某些方面降低中央计划的作用，但是它也要求中央对全国的经济进行更有效的协调。在这方面正在逐步取得进展。

十三、坚决下放极大一部分经济决策权和管理权，一部分下放给地方政府，但是主要是要下放到基层生产企业。这点不大容易贯彻。即使是在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在提倡权力下放以后，领导又不得不退回来而誓对又将权力集中到中央来以对付由于早些时候所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膨胀的影响。无论如何，北京现领导人中的大多数似乎相信，权力下放是使他们的总政策成功的关键。他们决心还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干。

十四、试验各种利润分成的政策，意图使企业的经理有更大的自主权，并且为他们和企业职工提供较大的物质刺激以提高生产率。这种试验已经在相当广的范围内进行了。然而，在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改革中国

现行的物价制度以前，全面推广它们可能还行不通。

十五、在较大的范围内允许市场力量影响经济决策。现在正为做到这一点而在作许多试验，现领导毫无疑问是决心要朝这个方向去做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要找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把计划和市场力量揉在一起也不容易。在政府继续试验的过程中还要经过大量的前后进退，左右回旋才行。

十六、正在继续争论中国在今后几年中最理想、最合适的价格制度。有些中国人力争实行三种价格制度（除国家规定的价格外还实行部分浮动价格和部分自由价格），类似在匈牙利实行的制度，但是也有人害怕这样做的结果会发展成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而他们是反对这种倾向的。

十七、正在对中国企业管理进行改革作试验。近来果取了一些扩大业务能力强的经理的权限的做法。这似乎是倒退到苏联式的在党委监督下的一长制。不过，中国正在寻找各种试图提高管理效率的方法。他们在认真地研究西方和日本的管理技术，试图将其中某些办法果用到中国的企业中去。

十八、大大强调用物质刺激来促使中国工人积极生产和提高工作效率。在毛逝世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号召增加物质刺激和指责“平均主义”。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允许增加工资，重新采用了奖金制度，并且在有些地方恢复了计件工资制。前两年，他们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对付政府赤字和渐渐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他们无疑仍然会坚决把物质刺激制度改进到合适的程度。

十九、积极鼓励城市中的集体企业和城市服务部门中的小规模个体企业——尽管后者还是试验性的。集体企业发展得比国营部门快（它们现在在数量上超过国营企业，雇用人员的数字大约占国营企业人数的五分之二，产值约占中国国营企业的五分之一。）虽然小型私人企业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权居然能允许有私人企业存在，同时私人服务行业已开始在城市里有了某些影响。

最后，毛去世后所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明确地承认为了使现代化成功，他们必须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以及经济、金融上的关系。他们现在坚决奉行邓小平称之为“对外开放”的政

策，并且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事实上，他们开展的许多对外经济关系都是不容易突然中断的。

中国人发展对外贸易的速度比他们总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得多。他们在进口技术和设备上的增长相当可观。在粮食，半制成品和其它必需品方面也是如此。为了支付扩大的进口额，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出口活动。有许多例子表明他们对能赚外汇的企业给予特殊待遇。

中国贸易的发展很了不起，然而，有一个更加具有戏剧性的与过去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做法是，北京改变了对外国贷款、投资和同资本主义商人合资办企业的态度。中国人现在十分积极寻求国外的贷款。虽然，迄今为止，他们对向他们提供的贷款还是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但是他们看来是在考虑比较大量地向外国借款——这在几年前，大部分观察家都会认为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直到现在，外国投资商们对承诺大规模的合资企业还是谨慎的，但是已经就小规模的合作性企业签订了相当数量的合同，尤其是在中国南部沿海建立的经济特区。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大力强调同外国发展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必要性，他们所作的最惊人的行动之一是派了几千名学者、技术人员和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在非共产党国家学习的已经有一万多名——仅在美国就有八千左右。这一大胆的举动在许多方面是担风险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共产党政府敢做类似的事情，然而，它将来会收到很大的效果，那就是可以得到帮助中国加速现代化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来填补这方面重要的空白。

这些政策上的改变——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说明中国现在奉行的新方针在很多方面反映出同毛时代的最后几年的方向几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是，仅仅列举现领导所想要执行的新政策还没有能回答一些基本问题，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这种趋势能走多远？这些新政策能持续多久？

许多比我更慎重的学者可能干脆说，这是无法知道的，所以为什么不等着瞧呢！但是我个人相信努力展望未来并且尽可能对北京今后的前景作出判断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作为政治领袖、外交家和商人——对了，还有学者——只要他们在最近几年中要对中国进行观察、分析，并且同中国打交道，那么他们即使不是公开地，也会在暗中判断中国会走得多远以及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能取得多大的成功。他们将在这个